

刘文西“领袖与人民”图像表达策略探析

李丽仪

(西安美术学院 广东 江门 710000)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领袖与人民”主题性创作广泛出现,成为中国当代人物画创作中的主流题材之一。围绕该题材的当代形塑中,跳脱政治图解以及程式化倾向,刘文西通过领袖情结的生活融入、集体记忆的情节叙事和政治理想的艺术呈现,为“领袖与人民”题材的图像表达提供了新路径。他成功塑造了典型化的中国领袖形象,同时为中国典型人物绘画的民族艺术语言探索提供范例。

【关键词】政治图解;“领袖与人民”;艺术策略;典型人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领袖与人民”主题性创作的政治性、时代性和探索性,这一题材得到艺术家普遍的关注。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文艺政策导向形成的主流文艺思想,直接影响到艺术家创作题材的选择;第二、对新时代理想领袖形象塑造的广泛需要,为政治图解应运而生;第三、出于艺术家自发的“领袖情怀”创作表达,造就的时代精品。

在20世纪60—80年代“领袖与人民”题材创作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呈现出程式化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有:构图形式单一,主要以中心式为主,领袖作为画面中心且与所有人民目光的焦点重合,代表作品有靳尚谊《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和赵友萍《听毛主席的话》等;受到中国古代人物画造型法则的影响,呈规则化的表达定式——“主大从小”,张福龙的《毛主席和青年农民》以及许孝诗《亲切的关怀》等这一特点倾向较为明显;人物表情塑造简单化和概念化,人民群众表达趋向单一,这一特点在年画创作中最为突出,如在唐小禾的《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和《万物生长靠太阳》中“领袖与人民”的表达。

刘文西“领袖与人民”的创作探索与以上艺术家的表达有所不同,他说:“我深深感到,革命领袖人物伟大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创作中,就要着力表现革命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精神特质。有些人的创作之所以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苍白无力,我觉得关键在于他缺乏实际的深入生活体验,缺少对生活本质的深刻认识,当然就不知道自己表现什么,只好表现非本质的事物。”基于“深入生活”的艺术创作观,刘文西自1957年开始,成功塑造了诸多“领袖与人民”的经典作品,按照创作时间和创作风格大致可以分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个阶段。

首先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刘文西“领袖

与人民”图像创作阶段的早期。《毛主席和牧羊人》(图1)作为这一主题性创作的开端,其表达视角便与同时期偏重政治图解的艺术家完全不同。在表现手法上,刘文西选用苏式传统素描强烈的光影对比,凭借扎实稳健的造型能力和多次实地考察的亲身体验,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塑造毛主席在杨家岭与牧羊人谈笑风生的瞬间定格。

这是他开辟“领导与人民”题材表达的第一次有益探索,不再从宏大政治图解视角切入表现领袖图像,而是深入真实陕北生活当中,把握领袖与人民亲密无间的本质表达。在1959年刘文西创作了《在毛主席身边》(图2),随后在1962年又创作了《同欢共乐》(图3)和《枣园桃李》(图4),均是刘文西工笔人物画的重要代表。其中《在毛主席身边》受到了叶浅予《民族大团结》的影响,为了突出人物而略去背景,在年画创作中巧妙运用传统中国画的“留白”处理,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年画《同欢共乐》同样是刘文西“领袖与人民”图像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土地革命后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主旋律。此后,毛主席和农民站在一起的群像处理方式广泛出现在刘文西的“人民与领袖”题材创作。从1944年末到土地改革时期,在农村根据地家庭的祭祀和村落的祭祀中,毛泽东像替代神像日益普及。《同欢共乐》利用毛泽东领袖像民俗借用的渗透,描绘领袖与人民群众一起欢庆土地改革,不仅使中共政策深入人心,而且符合人民的信仰。1962年创作的《枣园桃李》与《同欢共乐》同为年画,表现了毛主席对祖国下一代深切的关怀,这样的表现同样在他的写意人物画《毛主席和小八路》以及《关怀》中。

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是刘文西“领袖与人民”图像创作阶段的中期,在这十多年间他创作了诸多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典型领袖形象。在1964年所创作的《毛主席到陕北》(图5)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中的重要代表,这一群像



图1 刘文西 毛主席和牧羊人 纸本素描 1957 140cm×91cm

图2 刘文西 在毛主席身边 纸本工笔重彩 1959 108.5cm×155cm

图3 刘文西 同欢共乐 纸本工笔重彩 1962 128cm×91.5cm

图4 刘文西、陈光健 枣园桃李 纸本工笔重彩 1962 120×100cm



图5 刘文西 毛主席到陕北 1964-1965 着色素描 138cm×184cm

图6 刘文西 毛主席和年青人在一起 纸本工笔重彩 1965 80cm×98cm

图7 刘文西 知心话 纸本水墨写意 1976 161cm×263.5cm

组织方式再次出现在他1977年创作的《奠基礼——欢庆直罗大捷》中。《毛主席和青年人在一起》（图6）和《银花朵朵向阳开》则是他工笔人物画创作的精品，除工笔线描的精妙以外，其突出探索在于赋色。与表现同一题材的赵友萍油画作品《听毛主席的话》相比，刘文西《毛主席和青年人在一起》吸收了敦煌莫高窟壁画在中国人物画赋色方法的经验和启发，色彩鲜亮明丽。1974年创作的《知心话》（图7）中的人民，是刘文西根据二十里铺的村支书任立宏人物原型来进行刻画的，为了全面表达他身上陕北农民特有的精神气质，刘文西画了他多次速写进行素材的收集，人物形象创作鲜活饱满。

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刘文西“领袖与人民”图像创作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作品有创作于1981年的《星光》和创作于1984年的《解放区的天》。其中《解放区的天》打破以往领袖题材的中心式构图形式，将毛主席置于人民当中，通过表现中国传统新春佳节主席与群众共话家常，再现了革命历史的鲜活。刘文西的艺术语言也渐趋成熟，在这幅作品中可以看到他除了受到老师潘天寿“以线造型”的影响外，又结合西方艺术明暗立体表现进行线面转化，营造“纪念碑式浮雕”的人物表现艺术效果，同时在拓展线的丰富性和表现力上取得探索的成功。刘文西的“领袖与人民”图像表达即在继承前人“理”和“法”的群像绘画组织方式上，融入“情”与“趣”的交织，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领袖典型图像表达。其图像表达策略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领袖情怀的生活融入

领袖情结渗透到刘文西绘画创作的方方面面，这与他的创作初衷密切相关：“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画，使毛主席的形象能够深深地地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来，让人民世代不忘毛主席，永远铭记毛主席的贡献和毛泽东思想。”可以发现，刘文西在早期“领袖与人民”图像创作时便十分注重深入生活，搜集一切与领袖相关的素材，坚持每年到陕北采风，几乎徒步走完毛主席的足迹，从人民口中了解毛主席的感人事迹等。他用饱满的政治热情且联系时代描绘伟大的领袖形象，因领袖情怀已经注入刘文西的血液当中，他的“领袖与人民”图像表达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图解，而是真实感人的生活原型再现。

（2）集体记忆的情节叙事

一个经典图像的诞生与流传背后，离不开集体记忆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es 1877-1945）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刘文西“领袖与人民”图像

表达的成功，是其对新中国社会建构中典型事件的敏感捕捉，以《同欢共乐》和《解放区的天》最为典型。表现毛主席与人民欢聚的图像很多，在表现上趋向非理性从众，如上文提到的唐小禾作品《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刘文西所描绘的“领袖与人民”具有典型的情节叙事，选择的情节为欢庆中国传统春节，代入感强且气氛热烈，唤起观者在毛主席时代的集体记忆。这一图像策略的运用，很好地避免了程式化的倾向。

（3）政治理想的艺术呈现

刘文西“领袖与人民”图像的表达策略中，还融入了毛主席的政治理想，是对领袖形象和思想的直观化呈现。为了更好地塑造领袖，刘文西进行了大量的速写训练和真实历史事件收集；除此之外，他的“领袖与人民”图像饱含着毛主席浓浓的人民情怀。毛泽东人民观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元素，也是其最革命和最生动的部分，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指引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刘文西将毛主席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经由艺术构思到艺术物化的过程，将领袖与人民的艺术形象进行典型化的处理。因而相比于单独表现领袖形象，更有力量的是结合领袖的核心政治观念进行图像的有效转化。

中国当代“领袖与人民”图像的探索中，该题材早期表现存在政治图解和程式化的问题，青年刘文西找到了新的视觉表达路径。他通过深入生活、根植人民对该题材几乎进行了毕生的探索，形成了一套自我的中国领袖典型化图像表达策略。其情怀的生活融入、集体记忆的情节叙事以及共同理想的艺术呈现等有益的思考，对于塑造中国典型人物绘画的民族艺术语言亦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叶浅予. 吞吐古今, 涉猎中外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7: 5.
- [2] 刘思思. 刘文西. 绘不尽是黄土情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130.
- [3]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毕然、郭金华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9.
- [4] 戴立兴. 毛泽东人民观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2.

作者简介：

李丽仪，女，1994年-，广东江门，西安美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当代美术研究与批评。